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66-1976

虔诚与迷乱

第三辑
社会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顾训中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三辑(1966—1976 年)

虔 诚 与 迷 乱

社 会 卷

主 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顾训中

文 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0000

印数:1—10000 印张:14.5

ISBN7-80531-468-3/I·46

定价:26.00 元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皇皇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

已经开始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一种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20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1996年起逐年推出，到1999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推出的是第二辑两卷和第三辑四卷。

编者

1997年10月



红卫兵将北京东交民巷
改名为“反帝路”。



红卫兵扫“四旧”，拉倒
佛像。



“五七干校”的学员在学习毛主席著作。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走资派”。



“文革”中上海一所中学教室的墙壁。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向毛主席欢呼。



农村小学生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



红卫兵中的“三忠于”活动。



北京的红卫兵文艺宣传队在天安门广场宣传。

目 录

前言	(1)
十年一梦	巴 金(1)
“文革”记愧	史铁生(7)
八月十四日	楼适夷(13)
我相信	严文井(18)
小年夜	吴 强(26)
一次拯救我的批判会	梅 朵(40)
“文革”中一件好玩的事	杨宪益(45)
尼克松来访的日子	张从云(47)
“牛棚”小品	丁 玲(49)
云梦断忆	陈白尘(60)
淡忘后的回忆——读冯亚春同志的狱中札记以后	郁 风(80)
“牛棚”轶事	汪正章(85)
东单三条 33 号	韩少华(91)
《三上桃峰》事件始末	王 昭(99)
“马振抚事件”揭秘	郭晓平(121)
“王亚卓”事件	何 岚 史卫民(130)

彦涵与“黑画”事件·····	孙志远(144)
小靳庄的沉浮(节选)·····	高建国(163)
“蜗牛事件”闹剧·····	史 实(192)
当代野人——血与泪的回忆·····	王世岚(196)
中国“作协”“文革”亲历记·····	伍 宇(222)
“文革”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节选)·····	于光远(256)
在“1357”·····	汪东林(278)
草原大火·····	何 岚 史卫民(291)
被埋葬的青春梦·····	王冬梅(305)
“红”牌坊·····	丛 聪(331)
老红卫兵的心路历程·····	冯骥才(341)
虔诚的日子——躁动的一九六六年八月·····	甘铁生(375)
“典型”的悲剧·····	宋 群(384)
从副总理到小经理——孙健·····	蒋子龙(397)
尉凤英的往事·····	关庚寅 宋建波(411)
庄则栋的恶梦·····	关 鸿 黄 伟(421)
杨荣国的荣辱浮沉·····	钟健夫(442)
编后·····	(454)

巴 金

十年一梦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美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老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

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23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1970年的我和1967、1968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1966年9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都是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要马上交卷，我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1969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1969年5月23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

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绝不像1967、1968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我没有提1966年。我是1966年8月进“牛棚”，9月10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安眠药后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拚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12月。这可怕的12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

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1967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東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1969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1941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炼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

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到1969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这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1967、1968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得到呢？果然从1969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

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1966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1969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行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①,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选自《随想集》第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初版)

^① 见《神曲·地狱篇》第三曲:“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

史铁生

“文革”记愧

多年来有件事总在心里，不知怎么处置。近日看《干校六记》，钱钟书先生在书前的小引中说，若就那次运动（当然是指文革）写回忆的话，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这话已触到我心里的那件事。钱先生却还没说完，接着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了，以免岁月将其遗失。这样，也恰好有了篇名。

1974年夏天，双腿瘫痪已两年，我闲在家里没事做。老朋友们怕我寂寞常来看我，带书来，带新闻来，带新的朋友来。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么都谈，尽管对时势的判断不全相同，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想法也不再能彻底一致。那年我23岁，单单活明白了一点，对任何错误乃至反动的东西，先要敢于正视，回避它掩盖它则是无能和理亏的表现。除此一点之外，如今想来是都可以作为愧而记录的。

先是朋友A带来了朋友B。不久，B带来三篇手抄本小说给我看。现在记得住标题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标准归类，它应该属于“伤痕文学”，应该说那是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我看了很受震动，许久无言，然后真心相信它的艺术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动。这样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方法，那时很流行，现在少些了。